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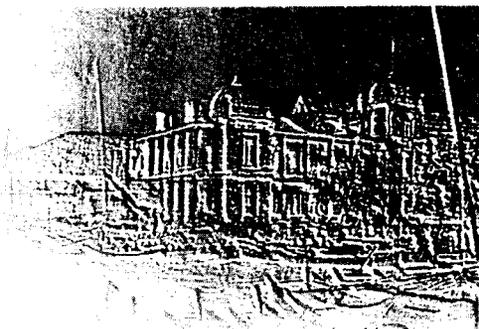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美】罗威廉 著 江溶 鲁西奇 译 彭雨新 鲁西奇 校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 总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 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曾和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而来，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 and 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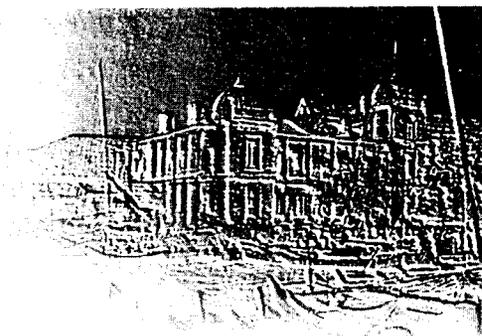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

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沛

2004年5月



## 代译者序

198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威廉教授新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是一本对19世纪汉口商业经济有着极丰富内容和独到见解的权威著作。该书的重要贡献，除细致阐述汉口作为商业中枢对有关地区各种商品集散运输起着总揽大局的作用以外，特别对商业行会的发展作了详尽的论证与精辟的分析。该书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为汉口“商业中心”，分章叙述1. 19世纪的汉口；2. 汉口的商务；3. 盐务贸易；4. 茶业贸易；5. 汉口的信贷与金融；6. 政府与商业。第二部分为“城市社会组织”，分述7. 乡籍在一个城市外来客民中的意义；8. 行会结构；9. 行会职能；10. 行会与地方政府。本书的书首有城市研究理论的导言，书末有汉口商业行会形成了政治力量的结语。

此书之所以选择清嘉庆元年（1796）至光绪十五年（1889）为起讫年限，是因起点年为兴盛的乾隆时代的结束，而接下来的嘉庆、道光期间汉口的商业却有着继续前进的势头；至1889年为止则因这一年改革家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使武汉在兴办工业的形势下发生了变化，而在这中间的93年便是汉口作为商业大城市在

原有经济机制下继续运转。其间太平军三次进军汉口，但不久即告恢复；1861年汉口对外开埠之后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汉口商业无重大影响。那么，在这93年之中汉口原有机制是否发生变化呢？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商业行会是推进汉口稳步前进的车轮，行会以其旧日的胎体孕育着其有生气的萌芽，在调整原有机能、充实内部力量之中步入了时代的轨道，这就是本书着重于商业行会叙述的特色。

对19世纪汉口商业城市历史地位的基本估价，在西方学者中存在着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以欧洲中世纪城市居民区发展所形成市民自治的“都市团体”为模式<sup>①</sup>，认为中国城市并不曾有过相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中国城市主要是适应行政管理需要的产物，其作为地方政府所在地和军队驻地的政治作用一直是首要的；中国城市的兴盛主要不是依靠市民在经济政治上奋发进取精神而是依靠行政管理。在这些基本性质上，汉口当然也不例外。另一派则认为近代商业发展所形成的商品集散中心，推动着城市与周围乡村之间、大中小各层次城市之间以及远距离大城市之间的商品交流，从而加强着日益频繁的商业组织联系；商业团体为着本社团利益不能不考虑对方的利益，有必要订出本社团共同遵守的法则，建立在确信合理的有秩序的市场基础上的质量管理，集体抵制对本行业有损害的外来压力（包括当地政府），并共同担负应分摊的当地社会公共事业的责任。这样，商业团体实际上进到自治政体的境界。这就是社会学者施坚雅（G. W. Skinner）用“中心地方”理论以研究中国城市的基本观点，罗威廉正是弘扬这一派理论体系的杰出者，他以明显实例推重汉口行会组织的先锋作用，驳斥着韦伯（Weber）等人的论调。

---

<sup>①</sup> 这一派有名的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真正的城市要把自己看做一个“都市团体”，必须在商业关系方面显示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特征：1. 城防；2. 市场；3. 自己的法庭以及至少有部分的自治法律；4. 联合公会组织；5. 至少部分自给和独立。这样就有了市民参与选举所产生的权力政府。（Max Weber, *The City*, pp. 80~81）

### (一) 从同乡会到同业行会

汉口雄踞江、汉汇口，同时又是数千里长江的水道中枢，因而显得商业地位特别重要。至清朝初期它已是一处有名的商业城市。但是它在行政区划上不过是汉阳县的一个镇。在商业发展中，这个镇以营业放任招致了大量外来客户，在19世纪这一时期中，外来户约增至占总户口的70%—80%，而堪称汉阳本籍在汉口营业的土著户则不过20%—30%左右。在来汉经商的客籍户中，由于商业经营的关系复杂以及商业竞争的激烈，他们为了本身利益起见，认为有加强同本籍在汉商户相互关切的必要，因而当康熙中期政局稳定之后，汉口客籍同乡会组织的建立一时竞相成风，以后仍继续发展，汉口成了数以百计的同乡会商业活动的集中舞台。

众所周知，同乡会对流寓他乡的客籍具有不可阻挡的吸引力。同乡人有着相同的乡音乡俗以及相互可以攀连的远亲近戚或世代友谊的关系，甚至原不相识的人只要是他乡相遇的同籍，便有一见如故的缘分。因此，凡遇到某些困难特别是营业亏损、金钱损失的时候，总会首先想到同乡人的可能帮助，甚至推荐业务上的助手和委托代办某项任务，也都不会不考虑同乡中的可靠朋友。这就是汉口这个商贾云集之地同时也是同乡会荟萃之区的原因。罗威廉指出：“老家观念巩固了商业团体，包括从批发商的公所到船员、船队、码头工人、建筑工人以及仓库职员之类的团体”；“汉口同一地区的人在生意上互相依赖和联系构成了由一定的同乡团体建立起来的地区之间的贸易网，地方产品和服务的专业化为其特征，甚至商号之间经营的产品互不相干也可以从同乡关系提供信贷的援助”<sup>①</sup>。

同乡会几乎都把“同乡”定为吸收成员的标准，但各个同乡会所选定的“同乡”往往大小各异。一般以一个县的籍贯为范围，由于会员专业性不同，某一个县在汉口的寄居人可能组成几个行会，例如湖北黄陂人就在汉口组织了几个行业会馆，即是以行业

<sup>①</sup> 原著第七章《乡籍在一个城市外来客民中的意义》。

为主而接纳本籍的同乡为会员，若行会所涉及地区更为广阔，则更有包含多种行业的可能，于是以行业为主组成行会有时并不考虑是否同乡而只是以同业为准。行会分成两个系统：同乡和同业。当然最好是既同乡又同业，如以特产为专业经营的行会（如湖北咸宁县的七个茶叶商店全销本县产品），以手工业产品推销为主的行会（如江浙各处各有特色的丝绸业），那样的结合会更显得巩固而持久。

商业行会以商业经营为主旨，行业性质是突出的。然而除了单一组织的结合外，更有多重的组织。多重组织所连接的地区和专业范围愈宽，则所包容的有机体愈复杂，例如山西和陕西人共同联合组成的“山陕会馆”包含 23 个成员帮，这些帮有的按籍贯建立，有的按共同贸易行业组成，有的则在同乡同行业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山陕行会将众多的行业结合起来，使它们自行调整营业、打开商品流通渠道并解决内部纠纷等等，当然有利于商务的前进，特别是它们同家乡生产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sup>①</sup>

以行业为主体的行会组织，既不以同乡籍贯为入会条件，同时也就尽量地接纳着本行业的各个个体户，以至形成一种声势，即凡同行业的非加入同一组织不可，由于这样，行业的基本力量也就显示出来。以米业为例：

汉口米业公所建于 1678 年（康熙十七年），是汉口第一个行会（也许是全中国第一个），其经过当地政府审批的规章是这样开头的：

我等从事粮食经纪，管理汉口米市，需有会议大厅  
供召集会众以商议米市规章，否则意见不一，度量无统  
一标准，我等将难以履行职责。而米为人所必需，若度  
量不一，将何以出示检查纪录，更何以见信于人？故此，  
我等会集订出度量准则，并将定期检查以昭郑重。<sup>②</sup>

<sup>①</sup> 据原著第八章《行会组织》内容摘编。

<sup>②</sup> 原著第七章《移民城市的地方来源（外来人口的原籍）》转引自根岸信：《买办制度的研究》，183 页。

当时当地官府对米市建立并不支持，米市经纪人经向上级指控，坚持成立了米粮公所，并因有了统一度量而米业有正轨可循，显然是一次进步。

汉口商人行会对 19 世纪的商业发展起着怎样的积极作用呢？书中举出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实例说明着几方面的实质性问题。

## （二）为了解决同业间利害冲突而扩大行会——以药材贸易行会、木材贸易行会为例

药材贸易行会<sup>①</sup>——汉口药材行业是随着明清之际汉口几经兵燹之后的恢复而发展起来的。首先占上风的是四川药材帮，次为河南怀庆帮、江西帮、浙江宁绍帮、陕西汉中帮等。他们为了垄断某些药材，在太平天国战后汉口重建期间贸易自由发展的气氛中，展开了尖锐的斗争。首先挑起矛盾的是江西会馆，它以营业实力让河南的禹州药材产区拒绝怀庆会馆，西安产区抵制汉中海馆。怀庆和汉中海馆于是采取联合行动，把其本地产的药材扣留起来不卖给在汉口的江西买者，而这些江西人针锋相对地给那些禁止别人进入药产区而自己把药拿往汉口市场去卖的同僚施加压力，不让他们卖给怀庆和汉中商人。实际上，怀庆和汉中商人还是从造成这种局面的江西会馆手中强行索取补偿以弥补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像这样以牙还牙的斗争，怎不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在大家都感到必须停战的情况下，1820 年 3 月所有活跃在汉口的药帮商人聚集于药王庙，草拟了一份详细的贸易总章，还列了一个细目表，标出在汉口市场上销售的 34 种主要药材，并按照药的产地分门别类，各种药名后附有 11 条贸易管理细则，其中包括药物出售装箱的型式、出售的约计单位重量以及被允许的差额百分比，规定买者和卖者应按价额付出的百分数作为牙行应拿的佣金等等。汉口全体药业商人必须服从以上各条。1820 年创立行会后的三年里，各省药材行会的首领都在药王庙聚会一次，讨论如何修改他们的规章以及度量衡和价格标准的详细条款，选出一个与

① 原著第七章《药材贸易行会》，273～276 页。

当地政府交涉签订合同以及与其他行业领袖交涉日常商务的正式代表（首事）。这样，汉口各帮药材业得以在统一的意志下共同前进。

木材贸易行会<sup>①</sup>——19世纪中期，汉口木材市场出现了激烈竞争的局面。清朝初年，江西商人将贵州优质木材贩来汉口出卖，随后湖南人从湖南水路运来竹木销售。1769年汉阳江岸出现了一长条沙岸，即后来的鸚鵡洲，这沙洲很快成了最好的木材市场，因为满载木材的大船不容易在汉口停泊和卸货，而在此则容易得多。到了19世纪40年代鸚鵡洲成了中国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要建水师舰队，加上海运大规模建造船只，使鸚鵡洲的木材需求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武汉木材贸易的历史记载着主要的三个行会之间的冲突，偶尔还有暴力发生。首先到汉口的是江西的两个商人行会：“江西帮”和“黄帮”（黄帮是由原籍江西后来移居湖北东部黄州府的商人组成的）。直到19世纪中叶，当汉口木材市场被鸚鵡洲这个附属木材市场挤垮之前，这两个行会一直主宰着汉口木材贸易。可是，湖南人抢先进入了鸚鵡洲而获得了垄断权，江西和黄州行会无法挤入。当时另有汉水流域的“汉帮”，他们在木材贸易中隶属于江西和黄州商人，他们幸免垮台的命运，并设法增加了他们在汉口市场的重要性。

太平军战事平息之后，随着木材市场的重新开发，鸚鵡洲上建起20多个湖南会馆，1865年湖南木材商人联合建立“两湖会馆”，它在以后的几十年逐渐提高了地位，于1875年和90年代初两度重建和扩建。当湖南人正在逐步踏上新台阶时，湖北汉帮商人瞅着日新月异的武汉木材市场也想重新涉足。70年代初他们到汉阳府衙门去控告湖南人，说鸚鵡洲不该由湖南人霸占。汉阳县长认为这是当地社团对外来社团的起诉，他强调既然鸚鵡洲是汉阳县的一部分，而且汉帮大部分由汉阳的商人组成，则所有的或大部分的商业贸易应该转给他们。他进而对湖南人实行经济制裁，

<sup>①</sup> 原著第七章《木材贸易行会》，269～273页。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美]罗威廉.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026.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